

●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07&ZD020）

我国生态文明 发展战略研究

刘湘溶 等/著

上



人民出版社

我国生态文明 发展战略研究

刘湘溶 等/著



人民出版社

-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07&ZD020）

序

党的十六大在提出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建设之后提出了政治文明建设，当时我曾判断，党的十七大必提生态文明建设。后来，这一判断得到了证实，我感到十分欣慰。我的判断绝非信口开河、主观臆断，而是理性思考、理论探索的结果。

我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就开始了生态伦理学的研究，这一研究 90 年代初获国家社科基金资助。后来，我又循序渐进展开了生态意识研究和生态文明研究，并出版了《生态伦理学》（1992 年）、《生态意识论》（1994 年）、《生态文明论》（1999 年）。《生态文明论》是我国大陆第一本关于生态文明研究的专著，它是我主持原国家教委“九五”人文社科规划课题的结题之作。另外，关于生态文明研究，2003 年我还和朱翔教授等共同编著出版了《生态文明论：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围绕“生态”做文章，团队其他成员亦先后撰写并出版了《环境伦理》（李培超，1998 年）、《危机与出路——人类生态环境问题透析与可持续发展》（毛德华，1999 年）、《土地生态学》（毛德华，2000 年）、《自然的伦理尊严》（李培超，2001 年）、《自然与人文的和解：生态伦理学的新视野》（李培超，2001 年）、《环洞庭湖经济圈建设研究》（朱翔，2002 年）、《推进湖南省城市化研究》（朱翔，2002 年）、《伦理拓展主义的颠覆——西方环境伦理思潮研究》（李培超，2004 年）、《可持续发展与素质教育》（周晚田，2004 年）、《自然之思：西方生态伦理思想探究》（曾建平，2004 年）、《寻归绿色——环境道德教育》（曾建平，2004 年）、《环境哲学的求索》（曾建平，2004 年）、《环境正义——发展中国家环境伦理问题探究》（曾建平，2007 年）、《可持续发展教育教程》（彭立威，2011 年）等著作，并发表了一批紧密相关的学术论文。



生态文明是世界各国，当然也包括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什么叫必由之路？必由之路就是只有此路而别无他路，走向生态文明乃一种趋势，趋势所迫，顺其者昌，逆其者亡。

生态文明有大小概念之分。小概念是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相关联的概念，具体内容涉及节能减排、植树造林等等。大概念则指的是一种人类文明形态，一种继工业文明之后，比工业文明更高级的文明形态，这种文明形态是对工业文明的扬弃而非全盘否定，在这种文明形态里或在向它跃迁的历史进程中，人类文明的方方面面都将发生深刻的变化，从而面目一新。其实，仅从小概念上看，生态文明亦应成为其他“三个文明”的基础。诚如潘岳先生所言：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均离不开生态文明建设，没有良好的生态环境，人们就不可能有物质享受、政治进步和精神愉悦；没有可靠的生态保障，人类的发展将会严重受挫，并由此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甚至陷入不可逆转的生存危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制度孰优孰劣，比的不是谁最能斗争，比的也不仅仅是生产力。还要比谁最公平公正，谁最共同富裕，谁最有道德文化，谁最能可持续发展，谁最能带来人的全面发展，谁最能使社会更加和谐。^①

光阴荏苒，我对生态文明的求索一直没有间断。2008年，我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战略研究”，并于2011年按时结题。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本著作便是我和我的团队围绕该项目研究心得、体会的集成。如果要作自我评价的话，我认为它的价值主要有三：一是在国内首次对我国生态文明发展战略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并提出了“一个构建、六个推进”的框架体系。所谓“六个推进”中的“六”，实为多的意思，也可能是“七个推进”、“八个推进”……这个框架体系具有开放性、包容性，以此为基础，可使研究的视野在“纵”、“横”两个向度上不断深化与展开。目前，我们正准备着这么做，在这本著作出版后，随即投入一套丛书的撰写工作。二是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坚持学术前沿性与战略对策性相结合，大量吸收了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并加以梳理，对于思考与解决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所面临或将要面临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具有较大的启发性，可为国家制定相关法规、政策提供参考与服务。三是不少见解有一定的创新性。

^① 潘岳：《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中国环境报》2007年10月19日。

例如关于生态文明核心价值理念和建设模式的见解；关于何谓生态化思维方式及其特征和基本原理的见解；关于推动经济发展方式应坚持三重取向的见解；关于科技生态化的前提以及我国科技生态化的路径的见解；关于消费方式生态化三大要求以及我国消费方式生态化推进对策的见解；关于在我国如何进行生态型城市建设和如何进行农村生态建设的见解；关于生态化人格的界定，以及怎样通过环境教育去培养生态化人格的见解等等。上述见解，有的我们已经通过《新华文摘》、《光明日报》、《哲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刊物发表，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由于生态文明还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新生事物，加之我国的国情和所面对的世情十分复杂，也由于我们的能力有限，研究工作难免存在不少疏漏、偏颇和失当之处，万望大家谅解，并期盼大家的批评和争鸣。批评和争鸣是学术进步不可或缺的动力与养分。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党的十八大召开了。继党的十七大报告之后，十八大报告用一个独立篇章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以“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作为结语。“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是我党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提法，它新就新在首次将生态文明提升到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时代的高度，并提出走向这个时代，不同的国家可能有不同的道路和模式。

正是立论这么一种高度，十八大报告系统地阐述了今后一段时期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重大意义、基本思路、基本要求和基本任务。我们将认真学习领会十八大报告精神，充分利用好多学科的人才资源，协同创新，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的理论与实践研究，为推动我国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贡献绵薄力量。

本书是团队集体耕耘的产物。我们的具体分工如下：

第一章、第四章，由李培超撰写；

第二章，由舒远招、周晚田撰写；

第三章，由刘湘溶、毛德华、罗常军撰写；

第五章，由朱翔、李静芝撰写；

第六章，由曾建平撰写；

第七章，由彭立威、舒远招撰写。

我作为课题主持人，主要负责团队的组织与协调，以及全书提纲的制定



和全书的修改统稿，并参与第三章的撰写。

此外，团队成员谢炳庚教授、李爱年教授、张润泽教授、周国华教授、徐新博士、李姣博士以及湖南师范大学环境教育中心的有关同志协助课题负责人做了大量文献综述和部分前期研究工作。湖南师范大学唐凯麟教授，中共湖南省委党校刘普生教授、周正刚教授，湖南省社科院朱有志教授，湖南省社科联周发源教授，国防科技大学朱亚宗教授、黄甫生教授，中南大学谭希培教授，湖南大学朱汉民教授、龙佳解教授，湘潭大学李佑新教授、刘启良教授，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廖小平教授，衡阳师范学院刘沛林教授，湖南省委宣传部邓清柯同志、殷晓元同志，省科技厅姜郁文同志，省环保局陈战军同志等参加了课题的开题论证会、专题研讨会和专家咨询会，对课题研究提出了诸多建设性的意见，使我们获益颇多。

最后，衷心感谢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人民出版社、湖南师范大学对我们的资助、支持和鼓励。华文出版社社长罗争玉为本书的出版给予了极大的帮助，人民出版社编辑刘恋女士亦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也一并表示衷心致谢。

刘湘溶

2012年4月30日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生态文明基本理论的构建	(1)
一、人类文明及其动力机制	(1)
二、人类文明的三大形态及其表征或特质	(17)
三、生态文明转型的必然性	(39)
四、生态文明的核心价值理念及其实现模式	(71)
第二章 推进思维方式的生态化	(87)
一、思维方式的基本含义、本质特性与典范形态	(87)
二、思维方式生态化的含义、背景和主要途径	(106)
三、生态化思维方式及其特性和基本原理	(130)
四、中国思维方式生态化的生动现实	(144)
五、加强生态化思维方式的指导作用,切实培育生态化思维方式	(158)
第三章 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的生态化	(177)
一、生态化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三重取向之一	(177)
二、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生态化必须积极践行循环经济	(188)
三、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生态化必须切实践行低碳经济	(223)
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生态化必须致力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与升级	(243)
五、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生态化必须制定和完善环境经济政策	(272)



第四章 推进科学技术的生态化	(307)
一、科学技术及其发展历程	(307)
二、科学技术生态化的基础	(326)
三、科学技术生态化的重大进展	(355)
四、推进我国科学技术生态化	(373)
第五章 推进城乡建设的生态化	(409)
一、城市、城乡关系的演进	(409)
二、城市发展的生态化趋势	(426)
三、中国城市(镇)化进程中的城乡生态建设	(450)
第六章 推进消费方式的生态化	(545)
一、消费与消费方式	(545)
二、文明的更替与消费方式的演变	(568)
三、消费方式生态化的基本要求	(583)
四、消费方式生态化的对策建议	(604)
第七章 推进人格的生态化	(640)
一、人格的生态化与生态化人格	(640)
二、推进和研究人格生态化的多重意义	(671)
三、环境教育与生态化人格的培养	(680)
参考文献	(721)

第一章 生态文明基本理论的构建

当人类历史延伸到一个新的千年之后，对人类文明演进轨迹、发展规律和未来前景的回溯与展望又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在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或引爆各种社会问题的关键点的背景下，探讨和研究“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问题的重要意义空前凸显出来。特别是对于我国这样一个现代化后发性国家来说，要谋求国家的长期稳定，就必须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加快生态文明建设。而系统地研究生态文明的理论体系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基础性工作。

一、人类文明及其动力机制

生态文明不是脱离人类文明演进的大道而歧出的一种文明形态，它的形成和发展体现了文明的一脉相承，展示了人类文明发展演化的基本规律。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文明的内涵及其发展的动力机制来获得对生态文明生成的必然性以及内涵特质、价值取向、实现路径等一系列核心问题的解答。

（一）文明的内涵

文明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在中外思想史上，都能发现许多关于文明及其相关问题的思考成果。

英文中的文明一词“civilization”源于拉丁文“civis”，最初的含义是城市的居民，特指人们和睦地生活于城市和社会集团中的能力。所以，“文明”一词在西方最先就具有人们摆脱荒蛮而达到的一种生活状态的蕴涵。以后，文明一词又引申为先进的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准，以及到达这一目标的过程。文明所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可以包括民族意识、技术水准、礼仪规范、宗教思想、风俗习惯，还可以包括科学知识的发展程度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境界等等，从以下这些词条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斑：



1961年出版的《法国大拉罗斯百科全书》将文明一词解释为两重含义：一是指教化；二是指一个地区或一个社会所具有的精神、艺术、道德和物质生活的总称。

1973年至1974年出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将文明一词解释为一种先进民族在生活或某一历史阶段中显示出来的特征之总和。

1978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指出，文明一般的含义是指社会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水平程度或者走出野蛮时代之后社会发展的程度。

1979年联邦德国出版的《大百科词典》从广义和狭义两个角度对文明一词进行了规定：广义的文明指的是良好的生活方式和风尚；狭义的文明则指的是社会脱离了人类群居的原始生活之后，通过知识和技术进步所形成和达到的状态。

.....

在中国思想史上，关于文明一词内涵的诠释也十分丰富。择其要者：

第一，光明，有文采之意。《易·乾》：“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疏曰：“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此类用法在中国思想史上还有很多，如南朝宋鲍照的《河清颂》中有“泰阶既平，洪水既清，大人在上，区宇文明”的字句；唐朝诗人李白《天长节使鄂州刺史韦公德政碑》云“以文明鸿业，授之元良”；明宋应星《天工开物·陶埏》中也有“陶成雅器，有素肌玉骨之象焉。掩映几筵，文明可掬”的描述，等等。

第二，意指文治教化之功。如前蜀杜光庭在《贺黄云表》中写道，“柔远俗以文明，慑凶奴以武略”，宋朝司马光《呈范景仁》诗中有“朝家文明所及远，于今台阁尤蝉联”的字句。

第三，指摆脱野蛮所达到的进步状态。明朝高明在《琵琶记·高堂称寿》中写道：“抱经济之奇才，当文明之盛世。”清朝李渔的《闲情偶寄·词曲下·格局》中有：“若因好句不来，遂以俚词塞责，则走入荒芜一路，求辟草昧而致文明，不可得矣。”秋瑾在《愤时迭前韵》中写道：“文明种子已萌芽，好振精神爱岁华。”鲁迅在《准风月谈·抄靶子》中谈道：“中国究竟是文明最古的地方，也是素重人道的国度。”

第四，指新的事物，与旧相对。如《老残游记》第一回中有这样的话语：“这等人……只是用几句文明的辞头骗几个钱用罢了。”

从以上所列举的内容不难看出,中外思想史上对于文明内涵的解读是具有明显的共通性的,文明一词所表达的中心含义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文明是一个“属人”的范畴。这里主要指的是,文明是针对人类而言,是人类活动的过程和结果,换句话说,人始终是文明的主体或创造者,这也就是恩格斯所说的:“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素质。”^①文明始终围绕着人的活动展开而发展。

其次,文明既具有时间性又具有空间性。文明的时间性体现的是,文明不是一个僵滞的实体,而是一个流动的过程,体现的是人类追求进步而不断超越的愿望和所达到的状态,它不断完成跨越和提升,它是对人类存在的绵延性和持续性的体现或肯定。文明的空间性所强调的是,文明不是抽象的理念,它有具体的载体和表现的样态,可见、可循、可感触、可探究,也就是说,文明都是需要一定的空间来承载的,文明的空间性是人类活动的真实性或客观性的写照。

再次,文明既具有层次性又具有整体性。文明的层次性所指的是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来对文明进行多层次的划分,如按照特色属性可以把人类文明划分为东方文明、西方文明等等;按照文明的构成属性将其划分为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等等。按照文明发展的时间序列将其划分为原始文明、农耕文明等等,文明的层次性实际上体现的是人的生存方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文明的整体性也就是指的文明的综合性或涵盖性,它的外延非常宽泛,“文明这个词听上去自命不凡,但没有词能像它一样可以包罗万象,囊括技术、家庭生活、宗教、文化、政治、生意、等级、领导、价值、性道德和认识论等完全不同的事物。”^②“文明至大至重,而且是包罗人间一切事物,其范围之广是无边无际的,并且不断向前发展着。”^③文明的整体性同时还指的是,它是人类整体或群体的产物,而不是凭由个人所独创或独享的,每个人可以为文明的产生和发展作出贡献,但是他并不能单独构成文明的主体。文明的整体性实际上表现的是人类活动方式的多样性和与现实世界关系的多向度的关联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36页。

② [美]阿尔温·托夫勒、海蒂·托夫勒:《创造一个新文明——第三次浪潮的政治》,陈峰译,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14页。

③ [日]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0—33页。



总之，文明作为体现人类实践过程和结果的范畴，始终与人类的生存发展相关联，可以说文明的脚步一直循着人类发展的足迹。本书所指的文明概念囊括了上述基本内涵，它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过程和结果在时间上延续和空间上的累积，是人类生活整体性和多样性的反映，是人类价值祈望的不断实现。

文明的这种内涵规定也在客观上决定了它必然成为一个不断被思考探究的问题。这是因为，人类的生存发展总是与文明的嬗变更替密切相关的，关注人类的命运就必然会关注文明的兴衰。所以，如果说省察人类是人类社会所追寻的永恒的命题，那么关注文明的发展也必然是人类思想史上的古老而常新的话题。

（二）文明演进的动力机制

人类生活是复杂多彩的，因而关于人类文明的话题也必然是丰富多样的。迄今为止，由对人类文明的思考关注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问题域”。如关于文明的起源，有人提出人类文明起源的决定因素是由于地理环境的影响，有人则提出政治集权的出现是人类摆脱野蛮状态的决定因素，还有人提出人类文明的形成源于灌溉水利工程的出现，也有人将文明的出现归结为宗教信仰体系的逐渐形成等等；如关于文明的类型或模式，有所谓的日神型和酒神型，有所谓的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远东文明、玛雅文明、安第斯文明等等；如关于文明结构和层次的划分，有所谓的器物文明、技术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语言文明等等。

但是在对人类文明进行反思和关照的过程中，都必然要触及一个基本的问题，即人类文明发展的动力机制是什么。因为无论探讨人类文明的产生、模式还是结构等问题，都要面对人类文明何以形成和如何成长为具有某种特征和结构的问题，所以，思考人类文明的动力机制是解开人类文明“秘密”的切入点。

从思想史上看，关于文明发展的动力问题也是一个众说纷纭的问题。许多思想家从不同的视角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析解答。

19世纪，法国历史学家弗朗索瓦·基佐通过分析近代欧洲不同国家的文明特质和欧洲整体的精神取向，提出了文明的发展是其内在要素的矛盾斗争的结果的基本结论。他提出自然环境对文明的发展有重要影响，但是他并不认同孟德斯鸠把自然环境视为文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或阻碍力的观点；他认

为圣西门将阶级斗争视为文明发展的动力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认为为仅仅分析政治斗争是有局限性的，他更多地致力于探讨社会矛盾斗争对文明的作用；他同时还吸纳了吉本、赫尔德、萨维尼、孔多塞等人关于人类文明具有持续发展趋向的思想，并将其运用于对文明进步与倒退的评判上。基佐虽然坚信人类文明是不断进步的，但又认为并非各种文明都能持续发展。他将人类文明分为两种：一种是单一性文明，另一种是多样性文明。所谓单一性文明即是从一个单一的事实或从一个单一的概念产生出来的文明，这种文明由于缺乏内在的张力，即缺乏多种势力之间的斗争，因而也就缺乏不断超越自身而走向进步的动能。所以，单一性文明即便有过进步，也缺乏持续性，因而难逃早早夭亡的命运。所谓多样性的文明是自身包含着多种矛盾因素的文明，由于它存在多种势力的相持、斗争与妥协，能够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进步，只有这样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他认为近代以来的欧洲文明就是包含着差异、矛盾甚至对立因素的文明，因而是具有光明前景的文明。基佐把文明进步的动力机制看成是文明内在因素的冲突与整合，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他以近代欧洲文明为标尺的思路却是褊狭的。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提出，人类文明的核心不是经济、政治和军事，而是文化，亦即宗教。据此，他将世界划分为五大文明体，即基督教社会、东正教社会、伊斯兰教社会、印度教社会和大乘佛教的远东社会。所以，决定一个文明的兴衰存亡的并不是它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力量，而主要是文化力量或以宗教为核心的精神力量。汤因比把人类文明看成是一个有机体，因而文明是一个从产生、生长、衰落到解体的演变过程。他认为文明发展的动力主要是对挑战的成功应战或者说文明产生于挑战和应战的对抗过程。他把挑战分为自然环境的挑战和人为环境的挑战，但又认为并不是任何挑战都能激起应战，挑战与应战之间应当保持着恰当的张力，也就是说文明的产生应当是对适度挑战的成功应战，而文明的成长则是挑战——应战——达到平衡——出现新挑战……如此不断重复的、有节奏的循序渐进的过程。文明的成长分为内外两个方面，文明的外部成长即是表现为对自然环境和人为环境的控制或征服，对自然环境的控制或征服主要通过技术水平的进步和提高，而对人为环境的控制或征服表现为军事征服其他地区的人民或地理疆域的扩张。文明的内部成长则表现为人的精神日益充盈和成长，具体来说，就是人要有自觉能力和自我表现能力，较高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准，即精神“自决”能



力。汤因比认为,文明的进步更重要的是内部成长而不是外部成长,所以衡量文明社会成长的标准是“自决”,即人类自身精神的进步、道德水准的提高。它表现为人们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能够对人类自身所创造的异己力量进行科学利用和有效控制。从这种意义上说,文明的衰落和解体也不是由外在客观因素造成的,而是由于精神上的失落所导致的。当然,汤因比所说的精神因素不是指一个族类的群体意识,而主要是杰出人物或少数英雄人物的精神气质和自决能力。当英雄人物陷入呆板、无活力模仿的机械性状态或者没有进行自我角色的转换,始终沉溺于对自己以往辉煌的眷恋,“依着他的桨叶歇息”,就必然造成对新的挑战无力应对的状况,文明的失落就难以避免了。以“挑战——应战”模式来思考文明的发展,体现了汤因比对人特别是杰出人物创造文明的主体作用的重视,也表现出了他企图通过精神——心理救赎文明失落并开掘新的发展路径的宗教情怀。汤因比用社会心理来解释文明的发展和变化,认为新文明的诞生、成长,是以社会心理和价值观念的变革为前提的,这比只是从器物的变化探寻文明踪迹要深刻许多,但是夸大精神的作用所带来的局限是十分明显的,文明最终又必然成为无法言说的神秘的东西了。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也对人类文明的发展进行了分析研究,但是亨廷顿的理论主旨并不在于关注人类文明的命运,而是借助于文明冲突来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冷战以后如何维持对世界的主宰地位寻找理论支持。他认为文明不过是放大的文化,而在不同民族、国家、地域和宗教的背景下,文化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但是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文明之间的交往是间断的或根本不存在,因而并不存在文明的冲突或者说冲突并不明显。但是,冷战期间,世界分为两极、三个世界,意识形态、政治、经济 and 军事的竞争无所不在,文明的冲突也就十分明显。冷战后全球第一次形成“多极”和“多文明”的状况,西方文明的影响在相对下降,亚洲文明正在扩张,特别是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化的结合将会对西方文明构成极大的威胁。所以,西方文明存在的基础在于把西方的文明看作独特的而不是普遍的,更新且应保护西方文化,使它免受来自非西方社会的挑战。而从人类文明整体着眼,要维持人类文明的发展和持续,就必须保持不同文明之间的共存与合作,而这需要世界各国领导人愿意为此付出智慧。从亨廷顿对文明的冲突的分析来看,他认为不同文明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对一定文化价值的认同,

而人类整体文明的延续在后冷战时代更取决于文化上合作与沟通。

由上所述不难看出,无论是基佐、汤因比抑或是亨廷顿,他们对文明发展的分析更多的是从关注西方文明而非人类整个文明的角度出发的,也更多地表现出为西方文明演化的合法性及其普适性进行辩护的倾向,而一些受到东方文化熏染的思想家们则对同样的问题表现出了不同的价值立场。

日本学者池田大作认为,西方文明发展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体现为自古希腊就奠定的理性主义传统的扩张。他认为,理性主义传统虽然体现了对人的主体性和认识能力的肯定,然而“这种从合理性的智慧和哲学思考中,寻求人的尊严的根据的思想方法,导致对其他缺乏智慧的生灵的蔑视,进而增强对同样是人,但未接受过智慧思考训练的人,或对思考方法不同的人皆加以轻视的风潮”。^①这使得西方文明在发展过程中更多地依赖于对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的“硬力”的使用,而硬力的使用又带来“魔性欲望的膨胀”,总是企图统治和征服其他人或其他存在物,这样必然会导致人与人的关系恶化和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崩溃。而这就会使得西方文明的发展陷入危机之中。池田大作认为,当今西方文明的危机实际上已经清楚地显现出来了,主要体现在:第一,物质世界的丰富与精神世界的贫乏如影随形,也就是说,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建造起了光彩夺目的物质大厦,但是人的精神家园却荒芜了,“西方科学所建造的‘全球一体’的物质世界,在今天已经越来越暴露出它的消极作用,导致这种状况的重要原因,毫无疑问是由于精神世界的贫乏”。^②第二,技术的进步为人口的急剧增长提供了物质条件,但也同时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因为全世界人口数量正是随着工业革命帷幕的拉启而迅速增加的,一方面大机器生产在客观上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另一方面技术的进步也为人口迅速增加提供了现实基础,因而为了养活庞大的人口,人类必然加剧对自然界的掠夺,从而导致各种公害不断出现,人类所赖以栖居的地球难以承受。第三,战争与暴力频繁出现,利己主义精神充盈在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人与人之间互相敌对,国家与国家之间互相敌对,而敌对的后果必然是战争的不可避免。针对这种状况,池田大作提出,文明发展的动力机制必须调整,这种调整方式就是要用“软实力”来代替“硬力”。所

① 池田大作、狄尔包拉夫:《走向21世纪的人与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2页。

② 池田大作:《佛法·西与东》,王健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页。



谓软实力就是精神力量、道德力量和宗教力量，其核心则是“信赖”和“友情”。^① 相形于西方文明，东方文明的运演方式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未来。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从治理新加坡的经验中深切地感受到，人们需要按照新的理性原则而不是西方式的理性原则来生活才能够抵制西方思想的侵蚀，而这种新的理性原则就是要汲取儒家伦理文化的精髓，将孝道看成是维护社会和家庭的核心元素，“孝道不受重视，生存的体系就会变得薄弱，而文明的生活方式也会因此变得粗野”。^②

中国著名学者季羨林则提出，人类文明在今天已经面临着调整或转型的重要时刻，“总之，我认为是西方的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而东方的寻求整体的综合必将取而代之，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将是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取代’不是消灭，而是在过去几百年来西方文化所达到的基础上，用东方的整体着眼和普遍联系的综合思维方式，以东方文化为主导，吸收西方文化中的精髓，把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更高阶段。这种取代在 21 世纪就可见分晓。21 世纪是东方文化的时代，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③

以东方文明为背景来瞩望人类文明的发展，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文明演进的精神力量和文化气质，从而把文明发展的动力机制归结为精神元素的嬗变，这种针对西方文明的缺失所进行的归纳探讨的确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和吸引力，但是其中也难免有令人疑惑之处。首先，将人类文明的发展完全看成是精神因素的变化，实际上是将文明予以了窄化理解。其次，将人类文明的发展过程看成是从物质到精神的转换过程并不符合实际，人类的精神或思想是文明发展的结果或者说是文明机体上生长出的璀璨的花朵，它总要有所依赖，离开了现实的物质基础，思想或精神难免失去根基而漂泊无依。再次，无论是西方文明还是东方文明都是人类所创造的整体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区域的文明由于受到自然、人文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的确会表现出不同的特质或价值取向，但是它们都表现了不同区域的人们在适应和改造环境的过程中所取得的进步和成果，因而都有其固有的活力元素和存在根据，当然也不可

① 池田大作、戈爾巴喬夫：《二十世紀的精神教訓》，天地图書有限公司 2001 年版，第 197 頁。

② 暢征：《小國偉人——李光耀傳》，學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23 頁。

③ 季羨林：《21 世紀：東方文化的時代》，《中國哲學與文化比較新論：北京大學著名教授演講錄》，人民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3 頁。